

郑观应近代市场观述评

黄 群

摘要: 为探索中国的“富强之道”,郑观应提出“商战”口号,并对培育和占领国内市场,进而开拓国际市场进行通盘筹划,形成了具备全新世界意识并以“商战”为基点的近代市场观。郑观应的市场观既是中国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全面阐释,又为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郑观应的市场观所彰显的走向世界的竞争意识,以及在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思维,不仅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且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 郑观应;富强之道;商战;近代市场观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9)7-224-03

作者: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贵州,遵义,563002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是晚清“商战”思想的集大成者。郑观应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多年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拟通过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梳理,透视其中蕴涵的近代市场观。

一 居万国竞事通商时代,必须“以商立国”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持续开展,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学习西方、“借法自强”成为一批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的杰出人物的共识。他们纷纷提出改革主张,酝酿形成了近代早期改良思潮。郑观应素怀忧国救世之志,他的政论著作《救时揭要》(1873年)、《易言》(1880年)、《盛世危言》(1894年)陆续刊出,成为当时改良思潮的代表作,郑观应也因此成为近代早期改良思潮的先导。

郑观应指出,中国要自立于世界,首先必须树立新的世界意识,抛弃传统的夷夏观念,“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与外国平等交往,并加入已有的国际体系——“万国公法”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他说,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已日益打破各国间的隔绝状态,将世界各国连为一体,各国以工商立国,相互竞争,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1]“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2]居于万国竞事通商之世,中国必须顺时应变,才能自强。

基于新的世界意识,郑观应提出,大力发展工商业是中国最根本的“富强之道”。他认为发展工商业是西方诸国富强的

原因,也是国际竞争的焦点。“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其未通商之始,划疆自守,不相往来。今则百货流通,各商云集。设此国之财,竟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将坐困。故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趋之如狂。”^[3]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造成中国社会财富“流溢于外”,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将逐渐陷于“枯槁”,这是比军事侵略更严重、更危险的后果。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只是“图末”和“治标”,并不能从根本上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彼不患我之练兵习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4]“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5]郑观应因此提出“商战”口号,呼吁振兴民族工商业,并大声疾呼:“习兵战不如习商战”^[6]。

郑观应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7]“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8]郑观应突出地强调以商为民之纲,并进而说明,无商则格致之学不能宏,种植之类不能广,制造之物不能精。在近代社会,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主轴。很显然,郑观应的“商战”并不是指单纯的商业贸易,其外延超出了单一的商业交换领域,实际上已构成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范式。郑观应的“商战”包括了社会生产多部门的协调发展,并强调商品生产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还进一步强调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流和价值思考。其涉及的范围,包括了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具备了近代资本市场的基本元素。因此,郑观应的“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具备独特内涵的概念,其“商战”思想的表达凸显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观,是建立在全新的世界意识之上的“自强之道”。

二 以商为战,培育和占领国内市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之时,中国早已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了西方列强的产品倾销地和原料掠夺地。郑观应呼吁以商为战,培育和占领国内市场,抵抗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并提出一系列主张。

首先,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机器兴利”,“以工翼商”。郑观应的“商战”包含了商业竞争,但不是指单纯的外贸之战。他认为商务之盛衰以工业为基础,有工艺然后有货物。他特别强调:“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商务之盛衰,不仅视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9]中国之所以在商战中处于劣势,是因为“制造不如外洋

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因而必须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加强中国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怎样才能“以工翼商”呢?郑观应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1]中国“亟宜招商集款,购办机器,自行织造,擅其利权”^[1],并进而提出中国“宜设专厂制造机器……各种机器能自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售于外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1]郑观应的主张,实质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要求,提出了中国建立机器制造业的新课题。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工业化已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与社会经济的这一变革潮流相适应,工业化思想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变革生产力,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要求在洋务思想中已初露端倪,郑观应则通过“机器兴利”的主张,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要求。他的“商战”理论始终与大机器工业相联系,并试图从近代工业和商业的内在联系上把握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并广泛地运用机器生产,是郑观应近代市场观的重要组成部份。

其次,主张建立新型的官商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初期以“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形式为主。早期的工商业资本家曾对“官督商办”企业寄予希望。但当洋务企业弊端日渐显露,特别是洋务企业中的“官权”与商人的“求利”要求不断发生冲突时,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出了“与民共利”,“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声。郑观应则强调中国应有“护商”的良法,建立起新型的官商关系,“用官权以助商力”。并提出设商部,订商律,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1]郑观应还提出官方应开放民间商办工业而不设任何障碍,“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外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1]官方对商办工业的管理,应“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实行民主选举,成立商董会,赋之以管理企业的实权,“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1]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内容。郑观应要求政府实行保商政策,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工商业者独立投资的能力和愿望的增强,并且希望国家政权力量在培育国内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主张广视角地考虑市场机制,形成市场网络。郑观应说:“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果有把握而后行。”^[1]所谓全局,包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

第一,掌握市场信息。市场需求在生产经营与市场实现的整个经济活动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郑观应有丰富的经营工商业的经验,非常重视掌握市场信息,他称之为“通商情”。郑观应说,有人认为:“商贾之事,只需略知贸易情形,即可追逐蝇头之利”,“岂知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欲知此道,不但须明旧日所传商政,并宜详求近日新法”。^[1]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信息的内容和数量亦随之扩大,而且变化多端。因此必须“思深虑远”,及时了解市场风云变幻,作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正所谓“逆料数月中之市场”,“知市面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1]

第二,金融货币是市场网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在进入近代前后,西方的经济发展与货币银行业的发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而建立起了十分发达的货币银行体系,而同时期,中国的货币银行业却继续停留在12世纪初的水平,根本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银行。”^[4]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经济成长。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设银行的是洪仁玕,而对银行进行深入分析的则是郑观应。1892年,郑观应提出:“今为之计者,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1]银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郑观应视之为“商务之本”和“百业之总枢”,^[1]并列举银行之利十条,其中有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代筹企业资金”;“银根短绌,可籍本行汇票流通”;^[1]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掣肘等等。总之,都是为了解决商品生产和流通中资金短缺等问题。同时,郑观应主张中国自铸货币,铸币本身可以赢利,更主要的是可以加速商品流通,促进市场贸易。

第三,发展近代化的运输通讯事业。郑观应提出要采用火车、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使商贾便于贩运,运费可助国用,进而贸易兴旺,税饷日增。建立新式通讯系统可使信息方便及时,边疆警报朝发夕至,还能有助于开启民智。近代化的运输通讯,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组成部份,又是形成市场网络的重要手段。

第四,兴办新式学校,培养有用的人才。不论是掌握市场信息,建立金融货币机构,还是发展新式交通通讯事业,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必须依赖于教育。通过教育,把科学技术传授给直接生产者,生产者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郑观应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5]传统的经书教义与科举制度,已经不能培养适应时势的人才了,所以郑观应力主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增添西学各科,诸如声光电化,天文地理,医药农政等等,改变以往那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状态,培养有用的人才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市场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郑观应把《学校》篇置于《盛世危言》中的突出地位,并身体力行地兴办电报矿务学堂、招商公学、半工半读技术大学,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

郑观应将“以商立国”作为前提,把发展近代化大机器生产,作为发展经济推动生产的起点,把商业贸易作为实现工业产品价值的手段,明确提出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来促进生产,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通盘筹划,形成了以“商战”为基点的市场观。郑观应的市场观,广视角地考虑市场机制,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是符合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具有进步意义和科学性的经济思想。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强国代替单纯的兵舰救国,与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要实现富强自主,要进一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建立健全国内市场,更需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此,郑观应提出了以下主张。

第一、“彼既以商来,我亦以商往”。近代中国,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是横亘在民族资本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西方国

家利用一系列侵略特权,将中国变成了他们“取材之地,牟利之场”,以致“耕夫耒耜,周体洋货”。郑观应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主要应在进出口贸易上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他说:“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以商往。”^[1]要做到“必使中国所需予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予中国者,皆可运售”。当时外国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是棉纱、棉布,郑观应针锋相对地提出:“然既杜洋布之来,尤须自织洋布,以与抗衡……以塞来源。”^[1]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茶,因此要首先振兴丝茶工业。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只要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制造出比外国更价廉物美的商品。如此,“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塞”,再把土产精益求精,远销外洋,“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中国不仅可以收回利权,还能开辟国际市场。

第二、自保利权,增强竞争力。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等等一系列殖民特权,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居于劣势。郑观应要求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海关主权。英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1]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郑观应主张改派华人担任总税务司等海关要职,并实行关税自主,对本国工商业者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通过政府的保护政策阻挡外来商品倾销,为中国商品的买方市场兴旺创造条件。

第三、裁厘加征,华商洋商一律平等。华洋货物在税收上的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原因之一。郑观应指出:中国必须调整税则,“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1]当时外商在内地运货只交子口税,而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郑观应对此极为不满,他指出,应该裁撤厘金,加征关税(指海关);内地贩运仍纳子口税,华洋一律征收。如此,一则中国收回利权,二则保证中外贸易双方税收平等,增强华商的市场竞争实力。

第四、设领事船,扶助华侨兴商。郑观应指出,“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监察之不及,则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船……无不百倍维持”,^[1]中国要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同样必须做到“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1]同时还必须创设轮船公司,发展轮船交通,往来于世界各地,运出本国商品,转运外国商品,以夺回利权。另外,郑观应还非常重视华侨商人在开拓国际市场中的作用。他认为许多华侨虽已加入外国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显示抚循,隐资控制”,华侨商人就可以中国为恃,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藪。”郑观应指出,只要政府鼓励和扶助华侨商人在海外兴商贸易,与中国建立起联系,“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2]这样,“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西欧并驾者,吾不信也。”^[1]郑观应关于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在国外

设领事等若干主张的提出,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可见其市场观不仅具有明晰的目标、开阔的视野,而且蕴含着特有的超前意识和启蒙价值。

四 结 语

关于近代中国的改革,陈旭麓指出:“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6]郑观应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的巨变,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将爱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寓于以“商战”为基点的市场观中。郑观应市场观,突破了重农抑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和政策的转变及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市场理论的初步形成形式,郑观应的市场观既是中国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全面阐释,又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

而今,郑观应时代的“商战”已经成为历史,世界正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化的时代。但是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不仅仍然存在“商战”,而且更加尖锐复杂。现代的“商战”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竞争力。中国参与现代国际市场竞争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最终赶上和超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这一目标与郑观应当年追求的“富强之道”主旨完全一致。因此,郑观应的近代市场观所彰显的走向世界的强烈竞争意识,以及在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思维,不仅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且具有现代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504、563、563、487、493、568、521、522、523、491、520、501、498、495、496、396、397、575、569、492、367、494、575、510页。
- [2]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74页。
- [3] 郑观应:《论商务》,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 [4] 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 [5]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 [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